



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器研究

石岩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

先秦时期青铜器研究

石岩
著



江西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 / 石岩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2008. 11

(黑龙江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81129 - 110 - 0

I. 中… II. 石… III. 青铜器(考古) — 箭 — 兵器 — (考古) — 研究 — 中国 — 先秦时代 IV. K875.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915 号

责任编辑 刘乃翹

封面设计 吉 桥

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

ZHONGGUO BEIFANG XIANQIN SHIQI QINCTONGZU YANJIU

石 岩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委党校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110 - 0/K · 3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石岩是我招的第一届硕士生，本科是学考古的，硕士生是研究古文字的。毕业后到档案馆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吉林大学来攻读商周考古的博士学位。我给她选了一个可以发挥她的长处，需要耐心细致收集资料进行梳理的题目，即收集先秦时代青铜鎒的全部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并想通过这项工作使她比较全面地涉猎夏商周考古资料，重温已长期不接触的考古文献，为她到大学任教打一个较好的基础。

当时，她从事鎒的研究，是和我的另一个博士生从事戈的研究同时并举的。我想，鎒和戈是先秦时期中国使用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两种青铜兵器，希望弄清这两类器物的历时性变化，以弄清它们究竟在断代上可以起多大的作用，所以应该全面收集和清理这两类资料。

石岩开始是全力以赴，抛开远在哈尔滨的、需要她照顾的家庭和孩子，住在吉林大学校内，进行查找资料和烦琐的分类排比工作。但到了后期，身体有病，难以为继，又不能无限期在长春做论文，所以最后在收罗资料上实难尽善尽美，我对她在分析研究上的要求自然也不忍心太高了。

虽然客观条件造成这种遗憾，但经她努力而终于如期提交的论文，毕竟对中国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先秦铜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每一个时期铜鎒有哪些不同的型式，理清了一部分型式的演变脉络，而且还可以方便地观察到不同地区的鎒各自的特有型式，并可以看出各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在文中把先秦时期鎒的发展分为“起始阶段—发展阶段—转型阶段”的想法，强调弓矢和弩矢的区别，都是值得重视的见解。现

在这项研究成果经过作者的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在黑龙江大学的支持下即将出版，是一件很可喜的事，对考古界肯定是一本有用的书。不过我希望读者们在利用这本书所提供的方便之时，一定不要忘记继续补充此书遗漏的旧资料和层出不穷的新资料，完善先秦铜镞的型式分类体系和分区特点，使石岩从事的这项研究不断深入下去。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谈两个问题。

记得我在确定石岩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之时，和石岩谈过一个想法，就是通过镞这种最常见的遗物，检验一下中国考古学中被奉为两个车轮之一的类型学的适用程度。后来因为要降低论文的难度，就不能再提这件事了。不过从本书反映的青铜镞型式的历时性变化情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类型学方法的核心——器物排队，只在很小程度上适用于镞的研究。

所谓类型学(typology)方法的核心，就其创始人蒙德留斯本人的解释，是把遗存按其外在形式的连续渐变排出一个个“联类”(滕固当时翻译蒙氏论著时所用译语，德文是 *serie*，对应于英文的 *series*，即连续、顺序、序列)。由于这种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应用时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中国考古学者研究各种器物时都套用这种观念：似乎种种遗物的形制总是应该按一定规律循时渐变的，可以排成一串串有序号的“式”，其中的每个式就可以成为断代的标准器。

然而，本书用类型学排比先秦镞的结果，可见附表 1、2、4，及图 1—23、图 2—16、图 3—26。可以看出，分型非常之多，东周时竟达 28 型，西周时也有 14 型，大量的型不能分式，也就是排不成队。能排队的大多只能排两到三式，只有夏商时期的甲 a 类 Aa 型分了四式，Ac 型分了五式。而且，有很多式是跨两到三个时段的。当然，从图中可以看出，夏商的甲 a 类 Aa 型和西周的甲 a 类 Aa 型是连续的，加在一起可以算有六式。这一型是接刃由弧变直，翼由短变长，后锋逐渐加长，脊棱由凸变扁来排队的。凡是不符合这种演变规律的甲 a 类镞，便被分为其他的型了。单拿脊透本的 A 型来说，就一共分出 Ab 到 Ag 六型。其中 Ac 型其实是翼一直较短而刃不

变直的, Ae 型是翼很早就变长而且变直的。Ag 型是翼很短就变直的。再加上附表 1 中表明早期的 I 式一直延续到第三段和 II 式共存, 图 2-16 中的西周 Ab 型鏃其实除刃直和脊圆外保持了很早期的特征, 可见从夏商到西周, 有大量的鏃是并不按甲 a 类 Aa 型各式所设想的规律来演变的, 我们在不知道 Aa 型的鏃在甲 a 类鏃中所占数量比例(根据已发表的报告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的情况下, 只能说这串形制演变比较看得过去, 但遇到一件不明期段的甲 a 类 A 型鏃时, 恐怕还是很难确定它应属的期段。

这种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个应该深思的问题: 难道人工制品的形制都应该是按一定规律循时渐变的吗? 难道不可能是在一定的共同遵循的规范之下(例如双翼, 翼为三角形, 起脊、有铤), 鏃的细部特征随时可有无规律性的种种微小改变吗? 同一时期不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变体吗? 同一种形制不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重复出现吗?

在世界考古学中, 遗物历时性排序的方法, 其实不止形制循序渐变这一种。现在已经译成中文的伦福儒和巴恩合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就提到了“共存关系排序法”和“频率排序法”, 这实际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只是中国考古学在使用蒙德留斯的方法取得很大成功后,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 只认一种排序法。这正在成为限制我们如实认识客观历史现象的桎梏。举例来说, 带钩是一种从春秋到西晋很常见的器物, 形式繁多, 王仁湘作了一次很详尽的研究, 却并没有排出合乎类型学要求的队来。他分的一种型式, 可以跨越“春秋——西晋”、“战国——西晋”、“春秋——东汉”这样漫长的时代, 却只举了一两种代表性形制。可能有人以为, 只要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一定可以更细地分型而排出更多式别的队来。我看最后的结果, 也许会比铜鏃分出更多的型, 或许会在某些型中排出看得过去的一串队来, 但最后还是拿到一件不明时代的带钩, 不知道应该分为哪一型, 定在哪一个时代。

类型学真那么万能吗? 中国考古学是不是可以改换一点思维

方式呢？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三翼镞和三棱镞的起源问题。日本学者很早提出，三翼镞和三棱镞都是在欧亚大草原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后来林巳奈夫提出它们都是中国本身起源的观点。本书虽然没有专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实际上已经用具体的材料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本书图1-10表现了商代在中原已经出现了三翼镞和三棱镞，虽然都是地层所出，或许会有晚期遗物混入的怀疑，但至少就三棱镞而言，由于得到天马—曲村遗址J7H259所出西周三棱镞的印证，以及本书图2-8所示西周的圆锥形、四棱形镞作为辅证，现在可以论定，三棱镞在中原地区早于东周就已经出现，绝非李济当年所说：“殷商西周的矢人却均没有用铜制三棱式。”一旦到了军队装备了强弩之后，这种镞型就迅速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几百年中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至于三翼镞，本书图2-5表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已经出现了镞身长短不同的三翼镞，是欧亚大草原上出现三翼镞最早的地区，中原地区春秋时期才开始流行的三翼镞，如果不是在更早的中原地区自身的三翼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也只能是在中国北方区三翼镞影响下借鉴的。而且，中原的东周时期的三翼镞，如本书图3-6所示，在圆铤、翼的内侧或有凹陷、翼的后方或有铜条和脊相连、具有圆锥脊等方面，都和西周以来中原的双翼镞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并非是简单地借用北方地区三翼镞的结果。至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主流镞型：扁铤和有銎的三翼镞，和中国境外的欧亚大草原地带的扁铤和三翼镞的关系，过去李刚在南开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中作过笼统的对比，本书则作了较细的一一对应的对比（图3-62）。但都缺乏对境内外材料年代学上的详细比较，无从确定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林 法

2008年3月8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夏商时期青铜镞研究	15
第一节 青铜镞的型式分析	15
第二节 青铜镞的分期与年代	40
第三节 青铜镞的分区研究	54
第四节 青铜镞的发展与演变	64
第二章 西周时期青铜镞研究	68
第一节 青铜镞的型式分析	68
第二节 青铜镞的分期与年代	83
第三节 青铜镞的分区研究	91
第四节 青铜镞的发展与演变	98
第三章 东周时期青铜镞研究	103
第一节 三晋两周地区	104
第二节 齐鲁文化区	147
第三节 燕文化区	170
第四节 秦文化区	183

第五节 北方区	191
第六节 青铜镞在各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218
第四章 先秦时期的箭制	227
第一节 青铜镞的铸造与安杆方式	227
第二节 箭的长度考察	231
第三节 箭的配给数量考察	232
第四节 关于弓矢与弩矢	234
第五章 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镞的综合考察	236
第一节 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镞的发展阶段与空间分布	236
第二节 青铜镞形制的演进及其在军事上的意义	249
第三节 青铜镞的多元化功能	254
结语	265
后记	268

绪 论

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青铜镞。从时间范围上，包括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与东周时期。上限起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下限至秦统一。空间范围则大致在中国版图的北部，因此统以中国北方来称呼，具体的范围，是指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及北方长城地带，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新疆地区因为资料所限，暂不列入研究范围。

箭是中国古代一种借助于弓、弩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又名矢，它由箭镞、箭杆、箭羽组成。由于年代久远，箭杆和羽难以保存，往往只有箭镞得以保存下来。同样，因为先秦时期的弓、弩也由于时间关系很难保存下来，所以本书只把箭镞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材料允许，也会对其他部分稍作涉猎。

所谓镞，是指箭的前端具有杀伤功能的部分。单单它本身是无法作为兵器的，只有与箭杆、箭羽等部件组合成完整的箭，再与弓搭配才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器具。石璋如先生对此有一句准确而风趣的描述：“有弓无矢，则弓不若一根棍子，有矢无弓，则矢不若一把刀子，好像现在的枪和弹一样的道理。”^①因此，弓与箭息息相关。

弓箭是在火器发明前最重要的一种兵器，因此有“言武事者，首曰弓矢”之语。镞在兵器的分类中属于远射类，李济先生把它归为锋刃器类的双刃器中的长兵^②。从夏代直至清王朝，它始终居于

①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1950年。

②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624~66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战争中兵器的首位。弓箭这种器物，在先秦社会里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射箭是先秦时期的男子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在君子所必须修习的六艺中，专门有“射”这一项，而各个阶层中所举行的不同等级的射礼，也是由弓箭的最初功能中衍生出来的。它的影响也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流传的古代神话中就有羿射九日、纪昌学射等故事，而“无的放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等与弓箭有关的成语直到现在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语。弓箭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还具有象征的意义：“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即生下男孩要用“桑弧蓬矢”向天地四方射六箭，然后才敢“食谷”，蕃国定期向所属国进贡弓矢以表归顺，天子赏赐诸侯弓矢以专征伐，等等。

弓箭的发明意义重大，它可以与人类对火的使用相提并论。最初，弓箭是用来狩猎的工具，利用它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使人类的食物来源更加广泛，并且提高了人类自身的防卫能力。遗憾的是人们在猎杀动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它同样可以成为杀人利器，于是它也就逐渐地成为战争中的武器。在冷兵器时代，弓箭的使用规模与技术等几乎成了战争胜负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掌握弓箭技术能力的强弱，可以直接影响到个人乃至一个群体自身的地位。它的发明和普遍应用，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各个历史朝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①

弓箭应用于战争的证据，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石镞的数量较以前增多。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中，在M316中葬有一具中年男性的尸骨^②，身上有残留的骨镞，该墓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4494 ± 300 年。这是我国目前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27~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月。

所见弓箭用于人类冲突的最早例证。列宁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引起战争。”^①正是因为私有制的出现，才开始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使得一些可以杀人的有锋刃的工具转变成专门用来杀人的特殊工具——兵器。因此，弓箭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除了保留原来的功能外，逐渐演变为兵器。

考古发掘中可以证明镞的产生很早，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使用镞了。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附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就发现过一枚石镞，它应是现在我国最早的石镞之一^②。石镞在旧石器时代发现的数量很少，到了新石器时代，镞的数量大增，质料不仅有石质，而且有骨质、蚌质与角质。

在新石器时代，镞的发展阶段大致经历了早期骨镞较多、晚期石镞流行的演进过程。以山东地区为例，在较早时期，骨镞的数量较多，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墓群随葬镞的20座墓葬中，出土60枚镞全部都是骨质^③。到了较晚时期的龙山文化，石镞数量增多，1960年潍坊姚官庄遗址中^④就有较多的石镞出土。这种情况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制作能力有关，在早期由于加工工艺还不十分发达，骨质显然比石质的更易于加工，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骨镞数量远远超过石镞是在情理之中的。另外，镞是一种消耗性的物品，在制作和加工时，首先也会选用最易于加工的原材料，以保证可以大量生产。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制造工艺有了进步，镞的质料也发生变化，磨制精细的石镞就日益普遍应用了。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镞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铜镞。最近在李水城的文章中提到在青海乐都柳湾聚落遗址发现1件锻造的

^①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三十卷，360页。

^②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39~58页。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1~83页。

铜镞，“体形扁薄，略起中脊，两翼稍长，铤部有三锋”^①，在柳湾遗址范围内，有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往在这里发掘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墓葬从未有发现铜器的报道，这件铜镞如果地层不存在问题，估计它属于齐家文化的可能性较大。那么，这将可能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的齐家文化铜镞^②，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镞。

一、青铜镞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青铜镞的研究历史，大致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

这个阶段的资料来源于安阳小屯的发掘，得到了一批有具体出土地点和层位的青铜镞。李济先生在《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③中，将殷墟铜镞与西方铜镞形制进行对比，对铜镞的起源问题作了分析探讨，认为殷墟的铜镞与当地的骨、石镞的形制有自然发展的过程。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④中，李济先生对兵器作了分类，并将铜镞归入双刃器类中的长兵类中，对镞形的演变及其在地面下的分布状况作了探讨，他对镞各部位的称谓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采用。

第二阶段：1949年以后

这个时期是青铜镞大量出土的时期，有关青铜镞的研究相对较多。

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稿》是我国第一部兵器通论性著作^⑤，

① 肖永明：《乐都县柳湾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239~277页。

③ 原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后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524~52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原载于《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1949年。后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624~66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⑤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书中对先秦时期的青铜镞有所涉猎。郭宝均先生在《殷周的青铜武器》^①中对青铜镞的类别、用途及流行时间作了扼要的介绍,列出殷周期通行的形式有四种:薄匕式、三棱式、圆锥式、平头式,认为各种形式以薄匕式为主,终殷周两代均未大变,三棱、圆锥、平头三式到东周始有,战国末才以三棱式为主,现在其说虽然在某些方面看来不完全准确,但这是继李济先生对商代铜镞研究之后又一个较全面的归纳。石璋如先生在《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一文中^②,对商代青铜镞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他根据典籍记载,考证了包括镞在内的整支箭的各部位名称、制箭所需材料、制作经过,并从古文字字形及今器等各种角度,来尝试复原殷商时期的箭,求证当时箭的长度。朱凤瀚先生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中,对铜镞的主要类别作了分类,并对先秦时期的铜镞的主要形制作了介绍^③。杨泓先生在《中国古兵器论丛》中,介绍了镞的历史,从石、骨镞一直谈到青铜、铁镞,对先秦时期的青铜镞的形制及演变均作了介绍^④。在《商代的兵器与战车》中,也谈到了弓箭,认为在商代战车作战的有效杀敌手段只有用弓箭远射^⑤。

国外对青铜镞研究做得最全面的当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他在《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中^⑥,对中国的青铜镞的各部位名称、箭的种类、《周礼·考工记》对箭的记载及矢人、各时代的箭的形制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证。

随着对兵器研究的广泛,对青铜镞的研究也开始增多。在一些文章中对青铜镞也开始作较系统的型式分析。

关于青铜镞的研究一般多见于综合性的论述中。对殷商时期青铜镞的研究,多针对在殷墟墓葬所出者。刘一曼先生在《论安阳

① 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111~118页。

②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1950年。

③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275~2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190~20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 杨泓:《商代的兵器与战车》,《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58~3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⑥ 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321~374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

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中,对安阳地区用镞随葬的墓进行了探讨^①;郭鹏在《殷墟青铜兵器研究》中,对殷墟所出的铜镞作了较细致的型式分析,并对形制演变作了概括^②;陈志达先生在《殷墟武器概述》中,将殷墟出土的铜镞作了概括总结^③。陕西地区,有巨万仓对周原岐山出土的铜镞的简介^④;罗西章先生对扶风出土的商末周初的铜镞也作了资料性的介绍^⑤。这些文章对我们了解陕西地区先秦时期铜镞的面貌很有帮助。在河北,唐晓燕对河北出土的商代铜镞也有介绍^⑥,齐心先生也对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铜镞作了型式分析^⑦。山东地区,王青在《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中收集了山东地区出土的两周铜镞,对其型式及演变规律作了研究^⑧。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收集了大量的北方式青铜镞^⑨,并作了形制分析和年代推断,虽然没有出土地点和单位,但却是研究北方式铜镞很好的参考资料。

专门性的研究多是围绕长身圆柱形镞进行的。陈春慧的《矰矢、恒矢、绕缴轴——兼与何驽先生商榷》及《恒矢考——平首镞定名》^⑩、宋兆麟的《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⑪、何驽的《缴线轴与矰矢》^⑫、丛文俊的《弋射考》^⑬等诸文都对长身圆柱形镞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①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3期,63~75页。

^② 郭鹏:《殷墟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集刊(15)》,129~17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③ 陈志达:《殷墟武器概述》,《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08~31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 巨万仓:《周原岐山出土的青铜兵器》,《文博》1988年5期,6~9页。

^⑤ 罗西章:《扶风出土西周兵器浅识》,《考古与文物》1985年1期,92~100转18页。

^⑥ 唐晓燕:《河北商代青铜兵器初探》,《文物春秋》2003年5期,15~19转74页。

^⑦ 齐心:《北京出土西周兵器研究》,《北京文博》1998年4期,5~22页。

^⑧ 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81~84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⑨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53~6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⑩ 陈春慧:《矰矢、恒矢、绕线轴——兼与何驽先生商榷》,《文博》1998年6期,50~53转65页。《恒矢考——平首镞定名》,《考古与文物》2000年增刊。

^⑪ 宋兆麟:《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文物》1981年6期,75~77页。

^⑫ 何驽:《缴线轴与矰矢》,《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46~48页。

^⑬ 丛文俊:《弋射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220~232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

虽然青铜镞出土的数量很大,形制也多样,围绕青铜镞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总体上对青铜镞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的却寥寥无几,在对先秦时期青铜镞的系统研究上,基本处于空白。主要表现在:

1. 研究成果少。对铜镞的研究,基本是在总体研究兵器的时候提及,且多是泛泛之谈,很少深入探讨,对镞的专题研究更是少见。
2. 研究基础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研究水平不均衡。商代河南地区的青铜镞研究相对比较多,其他地区各时期镞的研究比较薄弱。
3. 没有建立科学的类型学分析标准。
4. 没有建立铜镞的分期、编年序列。使得这类重要的器物难以在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编年及重要遗迹单位的断代研究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一) 研究目的

先秦时期,战争与祭祀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兵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青铜镞作为青铜兵器中流行时间最长、数量最多、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对它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文献中,对青铜镞记载比较详细的当数《考工记》,但是由于该书成书时间晚,此前的形制则难以查考。解放以后,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铜镞,对全面了解铜镞的形制演变提供了可能。

虽然青铜镞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可观的出土数量,但是由于对铜镞研究的忽视,使得这种在冷兵器时代占据重要席位的兵器在兵器史的研究中却处于薄弱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青铜镞同其他文物一样,也承载了浓郁的时代信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第一,铜镞具有更明显的时代性。由于青铜镞属消耗性物品,因此,它们被铸造的时间要比青铜礼乐器更可能接近被埋藏的时间,更能敏锐地反映出时代的变化。第二,它具有非

常强烈的地域性。兵器与工具是地域性特征最明显的种类,不同的文化系统在礼器上可以形式相近甚至相同,但在兵器及工具上却更多地保留自己的传统特色。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青铜器有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下,中原文化的影响一般多表现于礼器,这是由于统治者来自中原,带来了他们所习用的礼制(当然也可能有当地人接受中原礼制的情形)。土著民族文化的影响多反映于兵器、实用器,有时也作为纹饰在礼器上表现出来。”^①另外,兵器是最为统治者所重视的,故而它有可能为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人所学习、认同,因此,对青铜镞的研究,也能从中了解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总而言之,对青铜镞的研究,不仅对研究考古学文化本身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史及兵器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着重对下列问题进行研究:

1. 确立青铜镞的类型式划分标准。
2. 在目前出土材料日渐丰富的情况下,通过对青铜镞的类型学分析,理清这类兵器的演变过程。
3. 建立青铜镞的分期与年代序列。
4. 通过对不同区域间铜镞的比较,探讨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严格按照考古类型学原理,对铜镞进行分类与排序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探讨青铜镞的演变及发展规律。

对青铜镞的类型学研究是本文进行各种研究的基础。青铜镞流行时间长,分布区域广泛,形制多样,时代与区域特征均十分明显。要寻找出它们的演化轨迹和彼此间的传承或影响关系,首先要确定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类型学划分标准。

关于青铜镞的分类,以往研究者大多是注重某一个阶段某一

^① 李学勤:《镇江文物精华笔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